

津同学组成的“校庆活动筹备组”。每次校庆聚会前半年，他们就开始策划、征求意见、统计人数，每届活动前都要反复多次听取同学们的想法。就拿这次校庆聚会来说，筹备组同学早在去年10月就开始筹备，研究解决本次聚会面临的问题，首要的是住宿。孔宪清、张怀瑾等同学多次与校友总会联系，并冒着严寒到学校周边宾馆实地考察。他们及时向同学们报告筹备情况，征询意见，修改方案，早早地统计好了我班返校的名单，并报告给校友会。他们的执着和热情得到了校友总会的大力支持，最终同意我们入住紫荆公寓18号

楼。考虑到大家年岁已高，筹备组建议把以往以旅游为主的聚会改为以校园游和座谈为主，让大家有充分的时间促膝谈心，得到同学们的欢迎。

班级的凝聚力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汽一班同学感到在自己身后有着一个强大的“亲友团”，可以倾诉、可以互助，可以依靠，亲密无间。有同学说得好：60年前，一粒种子落在清华园肥沃的土壤上，成长为一颗大树。在全班同学的呵护下，不断培土施肥，使我们的大树更加枝繁叶茂。

2016年8月于上海

偶然的一生

○周庆琳（1962 建筑）

不知道所有上了年纪的人是否都像我一样，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忆往事。回想过去所走过的各个阶段，似乎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所以我把我的一生叫作偶然的一生。

考清华建筑系是非常偶然的。高中时对航空事业非常有兴趣，记得有一年北京组织各校少先队员在清华过夏令营，我们参观了尚在清华的航空系，引起了极大兴趣，当时就立志考航空系。特别是报考志愿前参观各大学，《光明日报》还刊登了我的一张参观航空学院的照片，好像命中注定要学航空专业了。当时，报考保密专业需系推荐，学校同意推荐我报考航空学院，但航空系已从清华分离出来，同时也推荐一些同学报考清华工程物理系。这

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在班里是学习委员，学习成绩也不坏，为什么不能考清华，心中很烦闷。正在这时，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了一句决定我一生的话：“清华建筑系也不错！”这一下打开了我心灵的一扇窗子，为什么不去考呢？就是这么偶然，我进入了建筑学领域。

我们建二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名班，我同汪安华、陈继辉组成的“三剑客”也算是班上的一朵小花。击剑运动在我国是个稀有运动，学校击剑队的产生与我和我班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是1957年冬天的一天，倪天增和黄中兴突然问我想不想学击剑，问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倪天增和黄中兴是校跨栏队的队员，教练孙树勋老师请



周庆琳学长

土木系李著景老师教他们击剑运动，李著景老师在美国留学期间学过击剑。孙树勋老师叫跨栏队的队员在班上找几个适合练击剑的同学来一起练习，于是我就参加了进去。后来，跨栏队的队员逐渐退出练习，我们剩下的几个人还是继续练习，为了扩大队伍我们还办了培训班，练习的人越来越多，在学校的影响逐步加大，终于使学校同意正式成立代表队。汪安华、陈继辉是后来招进来的队员，这样就构成了我们班的三剑客，轻剑、花剑、重剑一个剑种一个。击剑运动伴随着学业的学习走完清华的全过程，只可惜我后来得了肺结核，没能在击剑比赛中取得什么好名次。

毕业时的1962年正好赶上困难时期，我同我班同学共九个人非常荣幸地分到了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真是绝好的机会。设计院任务不饱满，毕竟是大院有高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编写《建筑设计资料集》一书，这对当时设计资料奇缺的状况，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出版后被建筑界称为天书。我们九人几乎全都投入到了这一工作中去，我参加到编写《中小学校》的

章节，后来又参加编写《医院建筑》章节。说来也真巧，2011年建工出版社和建筑学会决定重新编写第三版《建筑设计资料集》，因我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所以把《演艺建筑》章节的编写工作交给了我。人生路途从《资料集》开始，到《资料集》结束，真是蛮巧合的。

1964年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本想可以大干一场，但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时期就来到了。这十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生成长最关键的十年，但几乎都虚度过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在设计室，把绘图桌拼成一张大会议桌，大家围桌而坐，进行无休止的学习，批判，斗争。学完了又去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半的干校生活倒是让自己健康了许多，这也算是一个收获吧。

在干校度过的最快乐的一天，要算我们几个同学的一次远足。我们的五七干校在河南焦作附近的灵泉碑村，因为它在太行山脚下，村边有非常棒的泉水，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村子，居住在附近村子的同事经常到我们这里玩。一次建研院的同学屠舜耕、姜中光说起他们经常到太行山脚下拉石头，并说山里有一个叫滴水瓮的地方非常壮观，说得大家心里痒痒，于是约定了一个假日共同去旅游，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想法。某天假日，刘思绪、庄念生、曾点、麦木兰、朱爱理和我共六人，天刚蒙蒙亮就踏上了行程。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靠腿走，需要走一个半小时。好在遇见一辆空卡车，我们问司机能否搭车，司机也大方说这是个拉猪的车，又脏又臭。我们哪里在乎这个，六个人都上了车。同屠舜耕、姜中光会合之后，开

始了我们的太行山之行。

我们翻过了一座山后来到了一个平坦的峡谷，峡谷中流淌着一股清泉，我们时而越过清澈的小溪，时而越过满布乱石的平川，边走边玩又说又唱，大家开心极了，最后我们来到了峡谷的尽头，一个几百米宽五十米高的岩石峭壁呈现在眼前，巍巍壮观，更精彩的是峭壁中央裂开了一道缝，从缝中喷出一股泉水飞瀑而下，泉的背后形成一个水帘洞，在水帘洞后穿过，大家兴奋到了极点。晚上很晚了我们才回到灵泉碑，已是筋疲力尽，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没想到第二天连部把我们批评了一顿，警告以后不能再搞这样的活动。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

“文革”十年要说一点事都没做也不是事实。1966年初，单位交给我一项任务，负责中国援建也门萨那一个技术学校的设计任务，顺便完成中国驻也门使馆工程，并要出国考察。这是我第一次以一个工程主持人的角色接受任务，还要完成出国考察搜集资料的任务，使命艰巨不敢怠慢。工作进行得基本顺利，从方案到施工图全过程，体验到了一个工程全过程的各个环节。方案很一般但基本上符合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有意思的是，在设计过程中正好“文革”开始，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情况，当时身为室主任建筑师的杨芸竟为我画施工图；而身为院总建筑师的戴念慈则为我画透视图，我们有了问题也不敢向“反动学术权威”请教，“文革”中这种扭曲的现象到处都在。现在回想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做工程没出问题算是大幸。

1972—1979年对我来说是个黄金阶段，“文革”接近尾声，特别是1976年

后改革开放，设计思想宽松很多。这个时期领导也开明了很多，提倡大家敞开思想大胆创作，在这种情况下反倒觉得自己力所不及，底气不足了。特别是对国外建筑发展一无所知，起步步履艰难，整个建筑界都是这种感觉。我记得那时大量地请来一些国外建筑师同我们交流座谈，大家都睁大眼睛聆听国外建筑师的“教导”。好在中国人有个优点，学习别人的东西非常快，不久我们也渐渐地丰满起来。正好又赶上大建设时期，总算在这个时期做了几个工程。巴基斯坦体育馆，是我做的第一个大型公共建筑。巴基斯坦文化综合设施也是个复杂的大型公共建筑，很有伊斯兰建筑风格，但施工图做完后由于政治原因，此工程未能上马，相当遗憾。塞拉利昂政府办公楼，也是我国援建的重要工程，我1997年去塞拉利昂时，该建筑仍屹立在那里，是当地一座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1979—1985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体制发生



当年的三剑客。左起：周庆琳、陈继辉、汪安华。

了重大变化，开始酝酿从设计到施工开展对外承包工作，由于我院做过很多经援项目，就从我院开始组织人员开展了对外设计承包工作。我们首先选定了北也门，因为这里有很多经援项目，影响极好，同当地的政府和商人都有很好的交往，同时这里相对较落后，没有太多的竞争，也适合我们初试的阶段。这里不富裕，没有什么像样的工程，唯一一个重要的工程是总统官邸。也门人非常喜欢自己的传统建筑风格，特别是独具风格的也门窗，它是由贝壳灰雕刻出来的花格半圆窗，配上彩色玻璃，当阳光透过在室内形成五彩斑斓的景象十分有趣。在也门盖房子还有一个特点，一栋房子好像永远也盖不完，受资金限制，一栋房子按多层设计，根据经济实力一次建一层或两层，上面永远留着插铁，好像还没盖完。我们本来设计了一栋完整的房子，但只建低部几层，你所花费的心血不能完全表现出来，挺煞风景的。

1986年回到设计院后，本想乘国内大兴土木之际多参与点工程的设计，弥补一下前些年的缺陷，但回院后却担任起副院长职务，直到1998年。说起担任这个职务也十分偶然，我知道我并不善于同人打交道的管理工作，院长的工作并不适合我。另一方面，自从到设计院后并没有管理工作的经验，小组长、室主任都没有接触过，只是在也门期间担任过设计部经理一职。回院后正好赶上我院领导换届，担任新院长的正好是在也门的总经理，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就把我推荐为候选人了。上任后，工作起来十分劳累，整天忙忙碌碌，但回过头来想想做了什么却又一片茫然。最后总算做了外交部办公楼、张家港

国际会议中心、中国驻加蓬商务处办公楼等工程，现在很后悔没有早一点抽出时间来多参与一些设计工作。

1998年到了退休的年龄，正好中央决定建国家大剧院，要从文化部、建设部、北京市各抽调两个人组成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负责国家大剧院的筹建工作。从建设部抽调一个熟悉设计工作的人员，我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没有任何争议地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的建设。其实这个经历也是相当偶然的。

说起国家大剧院我们班同学都很熟悉。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就有国家大剧院，由我校进行设计，当时我们班虽然没有资格参加设计，但被当时轰轰烈烈的气氛所感染，好像也身临其境一般。记得当时的汪坦系主任在大会上大声疾呼：这是一个多兵种、大兵团的战斗，一定要搞好！参加设计的建九班同学也是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只可惜当时的国力不足，最后没能上马。90年代初期，文化部又组织人力编写国家大剧院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组织专家讨论，我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与会专家都认为是该建设国家大剧院了，但是还是由于国力不足没能实现。直到1997年才终于下定决心。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中央决定建设国家大剧院后，北京先走一步，马上组织国内几个大设计院和高校搞了一次设计竞赛，提供了九个设计方案，并隆重地请了40位专家用了三天的时间进行评选，我是评委之一。评选的最后一天下午，其结果已基本明朗，选中的是北京市院由魏大中主持设计的一个类似人大大会堂的方案。这时，院里来人叫我马上回院，说有

急事。我马上离开会场匆忙回院，党委书记告诉我：刚从建设部得到消息，国家大剧院的方案要通过国际竞赛产生，此次方案竞赛无效！这真如同晴天霹雳，九个方案40多个专家三天的付出全部作废，而且会还没有结束呢。我回到会场后什么都没敢说，我觉得这张纸不该由我来捅破，还是让会议有个圆满的结束吧。所以，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规模巨大的国际竞赛活动。

参加大剧院的筹建工作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工作内容，从一个为别人服务的乙方变成了别人为我服务的甲方，心情忐忑不安，肩负着历史重任，稍有不慎肯定会遭到各种指责。虽然这个责任不会落在我的头上，但是作为整个业主委员会唯一搞建筑的人来说，其态度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面对当时的反对声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公众解释我们为什么选中这个方案，它的优势在哪里，中央也在支持我们。最终反对声不多了，但我知道并非问题得到解决，而是反对派偃旗息鼓，等待时机。他们最好的时机是当大剧院建成后，从中挑出毛病再来理论，我一直等待这个时间的到来。但是到了2008年大剧院建成并投入使用后，这种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起来，我分析主要原因是：建成后大家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大剧院，特别是丰富多彩、变幻多端的室内空间和别开生面的室内装饰设计折服了大家，大家看到了一个确实不一般的剧院，已被多数人接受。这时我的心才落了地，总算没有白辛苦一场。当然到目前为止持反对态度的仍大有人在，这也很正常。

通过在大剧院项目中的甲方工作，我

深深体会到，要搞好一个工程，甲方的作用甚至大于设计方，因为甲方有权有钱，他可以主宰设计，而作为设计者的乙方是为甲方服务的，只能听从甲方的命令，如果遇到一个明智的甲方还好，如果遇到一个昏庸的甲方，你有再好的建筑师也没用。所以这次自己当甲方就特别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去当那种摆弄权术、乱指挥的甲方。因此，在开始工作前我就给自己制定了原则：对原则问题、基本功能问题要坚持意见，而对建筑处理上的问题如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讨论，但最后的决定权留给建筑师。既然选定了安德鲁作为主建筑师就要相信他的能力和水平。实践证明这样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整个建筑从里到外风格一致，手法统一，这一点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国家大剧院建成后形成了连锁反应，剧院建筑遍地开花，其实这并不过分，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有一个像样的剧院是应该的，特别是建国以来国家在文化方面欠老百姓的账很多，现在有了实力终究要偿还这笔账。随之而来的剧院顾问工作也不时找来，也算是最后的一点小小贡献吧。

如前所述，现在参加的第三版《建筑设计资料集》编制工作也算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小结，2014年已出版，时年76岁，这是最后的一项任务了。从编制第一版资料集开始，到编制第三版资料集结束，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2年，超额完成任务。